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政治參與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9-2410-H-029-005-
執行期間：99年04月01日至100年06月30日
執行單位：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計畫主持人：邱師儀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周睿盈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黃瑋婷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0 年 09 月 30 日

「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政治參與」結案報告（精簡版）

前言

承蒙此次國科會的資助，使筆者能在無憂研究資源供給的情形下，順利完成研究，此次研究題目為「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政治參與」，由於此題目延伸筆者博士論文之主軸，可以說應用美國的模式在台灣情形身上，一開始發現在詮釋上有一些崎嶇，譬如台灣人也不見得全然集體主義，美國人也不見得全然個人主義，因此在文獻探討的過程中，遂尋求「華人本土心裡學」的文獻養分，以楊國樞、黃光國與楊中芳教授主編的華人本土心裡學一書為綱（2009），發現原來台灣心裡學界，早已拼湊出華人心裡學的面向，有豐碩成果。

另一方面，畢竟筆者為政治學者之一，因此將華人本土心裡學的理論，植入台灣的政治學領域，並在領域中進行對話，至為重要，因此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發現國內外政治學界對於「華人本土心裡學」的對應，主要是交叉網絡的研究，也就是人際間因政治立場不同所產生的「交叉壓力」，與此交叉壓力產生的政治不參與之後果。但是交叉壓力屬於哥倫比亞學派的社會學變項，然而華人本土心裡學中延伸出來的變項，與密西根學派的政治心理學變項較近，因此筆者提出一個「衝突避免」的觀念，同樣也用來預測政治不參與。

筆者運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資料（簡稱 TEDS）¹（較不具因果性，但較具母體代表性），發現並不是所有種類的政治參與，都受到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因素的影響，個人為之的政治參與如投票，因不涉及人際互動，較不受這兩個因素的影響；社會互動式的政治參與，如拉票、政治討論，則較受影響。

另一個重點是，與誰一同參與政治也有關係，與過去研究發現不同的是，個體受家人不同意見的影響最小，但受朋友的影響最大，與鄰居與同事政治立場的不同，幾乎不受衝突避免的影響，只是若政治立場不同（交叉壓力），道不同不相為謀，不進行政治討論而已。

如此研究成果僅是一個開端，筆者在將來的計畫中，對於更廣泛的政治參與種類做檢證，也將繼續發掘「衝突避免」與「交叉壓力」的不同測量方式，來做更系統性的理論建構與檢證。

研究目的

此計畫的研究目的，經由一年來的沈澱、嘗試與精鍊之後，為明確的一個方向：

¹此外，關於此計畫，筆者還運用了東海大學大二學生總計四個班級的實驗法（較不具全國母體代表性，但具因果性），做公益感與政治參與關聯性研究，由於實驗仍在進形中，所以先不在此做介紹

將華人本土心理學中有關於驅動「政治不參與」的元素，與政治學中「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元素做連結，並運用台灣資料做檢證，對照是否與國外的研究結果不一致？或者也能夠運用在台灣的情形上？並奠基於台灣文獻，具體理論化關於台灣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論述。

文獻探討

由於精簡報告的關係，限於篇幅，文獻探討的部分，在稍後所附上的投稿文章「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台灣政治學刊，修改後再審）中一併介紹。

研究方法

此次研究主要採取量化的研究方法，計有「實驗法」與「問卷調查法」。實驗法的部分，主要測試華人本土心理學所建議的「華人公益感」與政治參與關聯性，儘管尚未得到系統性結論，但由於筆者所用的方法論創新，因此在此做方法論的介紹。由於政治參與關乎公眾利益，因此公益感高的同學，理當政治參與的程度也會高，方法如下：

測試三班大學二年級的學生，約200~300位學生，兩班控制為同一個科系，最後一班為完全不同科系的大二生，接著建立課堂固定座位表，在課堂前由助理在每一個學生桌上放一盤切好，尺寸一樣大小的蛋糕（下課後不易攜帶走），且附一杯紙杯裝的無糖綠茶（同樣下課後不易攜帶走），然後由申請者告知同學這是期末「老師請客，感謝同學一學期來的配合」。

接著正常上課，下課前十分鐘由申請者表示有事要先行離開（為避免影響同學處置食用後蛋糕盤子與空杯的自由意志），下課鐘響後，在沒有人提示垃圾要帶走的情形下，由五個安排好的助理觀察「個別同學是否將盤子與空瓶遺留在桌上」？「盤子與空瓶皆丟至垃圾桶」？「盤子或空瓶丟至垃圾桶」？「交給別人丟棄」？「幫別人丟棄」？「督促別人丟棄」？越是接近兩樣垃圾皆丟棄至垃圾桶，在事後的公益感編碼上分數越高，幫別人丟棄甚至督促別人丟棄者，也都可以拿到編碼上的加分，甚至由於蛋糕黏濕不易處置，在課堂進行間難保不會有同學打翻，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觀察打翻者的處置情形與四周同學是否挺身相助，協助善後？

教室屬於「公界」，環境整潔需同學們共同維護，預估一些同學會在這個公界環境中當中，因為需要丟蛋糕與空杯的刺激，反應出為搭便車的行為（freeriders），或者有些同學因為同樣刺激，反映出維護公界資源的行為，總之實驗法情境產生非常真實的人類反應，最後，靜待兩週過後當同學們淡忘掉了「吃蛋糕配綠茶」的記憶後，申請者再發送「核心問題群」的問卷，隨即完成實驗程序，編碼後即可進行統計分析。

關於問卷的部分，採用TEDS在多年份的問題，找到有關於交叉壓力、衝突避免與各種政治參與種類的題目，盡可能進行合併資料分析，極大化樣本數，也避免落於某些特定年份所產生以偏蓋全結論的可能。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研究成果的部分，目前計有三篇文章產出，第一篇為與劉正山教授合寫的英文文章“Network Heterogeneity, Partisan Defection, and Voter Turnout: Examine Theory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Taiwan”，已在匿名審查的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October, 2011): Vol. 2, No. 19 刊登。

另一篇為報告附件「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行動」，目前正在台灣政治學刊修改後再審當中，相信很快能有佳音。第三篇為即將投稿之文章「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社會資本」，也在緊鑼密鼓進行當中，關於具體的發現與結論部分，也在附件文章中一併交代。

整體而言，此次國科會計畫補助，提供研究助理協助，不管在報帳、跑統計，處理庶務部分，都幫筆者分憂解勞不少，也讓筆者能夠專心一致在研究事務之上，甚為感謝。

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行動

Conflict avoidance, Cross-cutting exposure and political abstention

邱師儀

Shihyi Albert Chou

服務單位：東海大學政治系

職稱：專任助理教授

主要學經歷：美國 University of Nebraska at Lincoln 兼任講師

專長學科及目前研究領域：政治參與、政治心理學、研究方法

聯絡地址：40704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第 372 號信箱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

電話：0981-413-712

電子郵件：s12357@ms24.hinet.net

個人網頁網址：<http://web.thu.edu.tw/albert6811/www/>

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

Conflict Avoidance, Cross-cutting exposure and political inactivity

摘要

Abstract

西方關於交叉壓力導致「政治不參與」的研究頗多，近年來國內以美國模型為依據，引進交叉壓力論述並進行經驗測試的研究也有一些，本文整合中外有關交叉壓力的假設，並進行經驗檢證。本文統稱政治不參與的各種行為，為「政治不活動」。問題意識為，是否交叉壓力導致政治不活動？是否特殊性質的政治參與特別容易受到交叉壓力的影響？是否社會學派變項的交叉壓力，能夠有一社會心理學派的對照變項，也就是衝突避免呢？是否衝突避免也同樣具有導致政治不活動的效果？與不同對象—家人、朋友、鄰居與同事—因政治立場不同所產生的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是否在導致政治不活動的結果上有所不同？本文運用台灣民主與選舉化調查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獨立樣本），發現與朋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會導致延遲投票與避免拉票，比起與家人、鄰居、同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更具預測政治不活動的效果。衝突避免的傾向，比較能夠詮釋與鄰居與同事避免討論政治，但卻與家人、鄰居避免討論政治，不具統計上的關連性，可能是由於與家人太熟，與鄰居太陌生，而感覺不到與他們之間會有出現衝突的問題，本文進一步解析與不同對象產生交叉網絡與衝突避免的細部情形。

關鍵詞：交叉壓力、衝突避免、政治參與

Keywords: cross-cutting pressure, conflict avoidan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

Conflict Avoidance, Cross-cutting exposure and political inactivity

壹、前言

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沒有民眾在政治系統輸入他們的支持與反對，政府容易獨裁(Tocqueville 1830)，但有很多因素阻礙民眾的政治參與，從密西根學派的觀點來看，心理因素與政黨認同預測投票行為與廣泛的政治參與(Campbell, Angus, Philip Converse, Warren Miller and Donald Stokers, 1960；Fiorina, 1981；Bartels, 2000)，若選民心中對政治參與缺乏興趣，或者對政治感到反感，則不會選擇去參與。

從更早期、興起於 1940 年代的哥倫比亞學派來看，個人所身處的政治脈絡驅動人們去參與政治 (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68; Agnew 1994; Carmines and Huckfeldt 1996)，哥大學派從社會學出發，主張周遭環境激勵政治參與，同理，周遭環境也有可能抑制政治參與，尤其當家人、朋友、鄰居與同事與個人政治立場歧異時，彼此之間所產生的衝突，導致個人延遲投票決定(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44, 60)；避免衝突的心態也使人不去參與抗議、競選造勢，與政治討論(Ulbig and Funk, 1999, 275)；廣泛來說，一般民眾對於充滿衝突的政治議題，顯得立場搖擺(Mutz 2002)、態度冷漠以及興趣缺缺(Hovland et al., 1953, 283)。也有研究發現，居民充滿歧異政治意見的社區，比起居民分享均質性政治意見的社區，有較低的社區事務參與率 (Alesina and Laferrara 2000; Campbell 2004, Costa and Kahn 2003)

人際之間對於政治意見與立場的歧異與紛雜程度，或者個人身處一個周遭政治立場與政治意見不一致的環境，對於這種情形，西方學界稱之為「交叉壓力」(cross-cutting pressure)或者「交叉網絡」(cross-cutting network) (Simmel, 1955; Popkin, 1965; Hope, 1975; Horan 1971; Jackson and Curtis 1972; Davis 1982; Knoke 1990; Mutz 2002a; 2002b)，國內學界也有人稱其為「人際網絡異質性」(network heterogeneity) (Liu and Chiu, 2011)。吳重禮、鄭文智和崔曉倩(2006:600)具體描述交叉網絡的特性：個體與所處團體構成一張社會網絡，當此個體處於這個「矛盾、對立、衝突的社會網絡之下」，個體傾向不參與政治，這種不參與，源於個體顧慮自己政治立場太突兀，為避免衝突、顧慮群體和諧而選擇不參與。

進一步細究，其實「衝突避免」與「交叉壓力」緊密相關，分別代表社會心理學的密西根學派論述，與代表社會學的哥大學派論述²，衝突避免代表個體內心的、主觀的一種認知與傾向；交叉壓力則代表個體周圍的、客觀的一種政治立場紛雜的狀態，兩者理論上都與政治參與成反比關係，即民眾選擇「不去」參與政治，在本文以「政治不活動」(political inactivity)統稱之，此一辭彙由 Verba 等人在討論民眾不去參與政治活動時所提出(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127)。

本文運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or TEDS)2008 年立委選舉資料，接續政治參與文獻中，很重要卻常常不易產生重大(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127)，或者不易產生一致性發現的研究面向：導致公民政治不活動的因素有哪些？經文獻探討，筆者假設公民因害怕衝突、追求和諧而選擇政治不活動，然而有些研究者無法釐清哪些政治參與種類，容易因為衝突本質而不受公民青睞 (Kenny 1992; Leighley 1990; Mutz 2002)？因此筆者進一步釐清各種政治參與活動是否具有衝突本質，與政治不活動之間的關係為何？一連串的研究問題有：為什麼有些公民選擇不去政治參與？公民最容易「放棄」參與哪一些類型的政治活動？害怕政治參與過程中所產生的「人際衝突」，是不是容易使人放棄參與？是不是所有政治活動都富含這種使人遠離的衝突元素？

2 詮釋政治參與的另一大學派為理性抉擇模式，由於不在本文重點，因此不予討論，相關文獻請見 Key, V.O Jr. 1964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Downs, Anthony, 1957,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Rational Abstention" Ch14 of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貳、國外文獻

以哥倫比亞大學學派出發，主張交叉壓力抑制選民政治參與的研究，在 1960 與 1970 年代僅找到有限的佐證資料，例如 Pool, Abelson 與 Popkin(1965)研究 1960 年的總統大選，無法得出「交叉壓力抑制投票」的結論，然而，這些早期研究發現交叉壓力極有限的影響力，可能是因為都把選民在特定社會類別中的成員身分(譬如基督教徒、中產階級)，當作是身處交叉網絡的狀態了(類似批評請見 Horan, 1971；Mutz 2002)。1970 年代關於交叉壓力的研究仍然困頓，甚至有研究發現「交叉壓力導致政治參與」的相反發現(Knoke 1990，有詳盡的文獻回顧)，不過有可能是因為當時判定「是否有交叉壓力的存在」，係由研究者就受訪者所在社會類別中，認定是否受到同儕間交叉壓力？恐怕流於主觀(見 Mutz 批評, 2002, 839)。

近幾年，全國性的民調問題已納進由受訪者自己列舉是否感受到交叉壓力的「直接測量」，於是一些研究陸續發現交叉壓力的存在，的確與政治參與成反比(Ulbig and Funk 1999; Mutz 2002)，然而研究者更關心哪一些特定的政治參與活動，特別容易受到交叉網絡的影響，這與該活動是否涉及人際互動？是否引起歧異意見(opinion disagreement)等因素？息息相關，這些因素容易造成衝突，使意圖參與者最後退避三舍。

Huckfeldt (1979) 與 Giles 和 Dantico (1982) 發現參與者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會影響具社會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例如「助選造勢」與「與人合作向政府請願」，這是由於社會脈絡提供參與者參與的依循路徑，所以能導引民眾去涉入人際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但若政治參與由單獨個體為之，例如投票、捐款給候選人，則個體從事這些活動時，不受社會脈絡中隱含「應該怎樣參與」的暗示影響(Zipp and Smith, 1979)，據此，Leighley(1990, 467)運用 1970 與 1976 年的美國國家選舉調查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再次檢證這種社會互動 vs. 個人單獨為之的政治參與的分野，意外發現政治討論者彼此之間的政治衝突(conflict)，反而導致投票行為、接觸政治人物，與替候選人助選，統計關聯性的方向不但與一般預測交叉壓力的方向相反，Leighley 的研究也沒有找到社會互動性政治參與 vs. 個人性政治參與，與交叉壓力之間的特定關係。

Ulbig 與 Funk (1999, 269) 重新整理社會互動 vs. 個人單獨政治參與之分類，將政治參與分類為公共的(多衝突)對上私人的(少衝突)；特殊利益的(particularistic, 少衝突)對上更廣泛的(far-reaching, 多衝突)的參與，這裡分類的核心元素其實就是「衝突」，「抗議」的衝突性最強，「助選」與「討論政治」居中，「投票」由於其秘密投票性質最不具衝突性，與「接觸官員」同樣具有溫和的性質。結果發現(Ulbig 與 Funk, 1999, 275) 越傾向避免衝突的人，越不會參與抗議、參加助選與討論政治；而投票與接觸官員則在統計上與避免衝突沒有任何關聯性，與交叉網絡與社會互動性政治參與的假設關聯方向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Ulbig 與 Funk 對於衝突避免的測量，只由一個題目構成：其中一端是「受訪者避免進行政治討論，因為政治討論的經驗可能使受訪者感到不愉快」，另一端則是「即使有可能導致言詞上的爭鋒相對，受訪者仍舊喜歡討論政治」，這樣的測量，與受訪者感受到³與旁人政治立場不一致之「交叉網絡」的測量(社會學、外在環境式的)差異頗大，反而比較接近密西根學派社會心理學式的測量，也就是受訪者內在對於人際衝突應該要避免的認知。

Mutz 的交叉網絡研究(2002)，結合外在人際網絡政治意見的不一致，與內在個體避免衝突傾向的元素，再來預測「政治不活動」，Mutz 先在理論層次建構兩個與社會心理學緊密相關的架構，第一個是「政治兩難」(political ambivalence)，指若個體身處一個無法與自己政治意見相符合的環境中，這時候個體內心產生掙扎，原本的政治傾向開始動搖，也變的不確定，政治兩難與缺乏政治態度是不同的(見 Alvarez 與 Brehm 1995, 1997)，前者是政治意見的立

³ 儘管受訪者感受到與旁人政治立場不同，不必然反應彼此之間實際的政治歧異，但國內外的民調多是用「受訪者自己來評估」進行測量；此外，受訪者自己評估所產生的認知，終究是會不會阻礙政治參與的關鍵因素？換言之，假設一個受訪者「實際上」與旁人的政治立場完全一致，但只要這位受訪者感受到自己與旁人不同，不管是怎樣的原因造成這樣的落差，仍舊是社會脈絡給這位受訪者最終的衝擊與印象，進而影響其是否參與政治的決定。因此由受訪者自己來評估是身處交叉壓力中，有其測量上的基礎。

場受到干擾，後者是原本就沒有想法。個體面臨內心政治兩難的情形下，參與政治的可能性自然降低。

第二種是社會責任說(social accountability)，社會責任說的核心概念為和諧觀，當個體面臨到紛雜政治意見時，社會責任不是讓個體難以決定該採取誰的立場？而是採用任一方的立場，恐怕會對另一方沒有辦法交代，難免破壞「社會和諧」(social harmony, Mutz, 2002, 840)，所以 Mutz 用「衝突避免」(conflict avoidance) 來測量這種顧及社會和諧的個體傾向。

在模型建構階段，Mutz 同時納入交叉網絡⁴，與兩個社會心理學變項「政治兩難」與「衝突避免」，結果發現「交叉網絡」與「政治兩難」與「單獨進行性質」的投票產生統計上的關連性，身處交叉網絡與具有政治兩難傾向的受訪者，在 1992 年總統大選中傾向投票棄權，同時也延遲投票決定。「政治兩難」與「衝突避免」同時還詮釋受訪者不參與衝突性強的種類如抗議。

也就是說 Huckfeldt (1979) 與 Giles 和 Dantico (1982) 對於政治參與種類的分野，在 Mutz 的研究中並未被支持，交叉網絡與政治兩難不但詮釋衝突性的政治參與，也詮釋不具衝突性質的政治參與（例如投票與接觸官員），可能的原因為：縱然有些政治參與種類，在非社會互動情形下進行，但是所有的政治參與都由社會建構，因此被人際網絡與政治兩難所詮釋 (Mutz, 2002, 849; Kenny, 1992)。重要的是，在 Mutz 的模型中，當「交叉網絡」、「政治兩難」與「衝突避免」詮釋 1996 年總統大選中的投票行為，個別交叉網絡與衝突避免變項並未顯著，但這兩個變項的交互變項呈現負的顯著，換言之，「衝突避免」本身不會抑制投票決定，只有在配合「交叉網絡」時才會抑制投票，這意味政治參與行為，不見的無時無刻都促動個體心中那個害怕破壞和諧的按鈕，只有實際身處四面意見不一致時，衝突避免才顯現詮釋政治不活動的一面。至此，從 1970 年代至 Mutz 兩千年後的研究，對於衝突避免與交叉網絡是不是只對互動性強的政治參與有所影響？尚未有定論，本文遂有運用台灣資料來測試這兩種說法的動機。

倒因為果的可能性

總之，不管是交叉壓力，或者是衝突避免都指涉一個使人不去參與政治的原因：社會和諧。因為個體害怕破壞社會和諧，或者為維持社會和諧，因而導致個體不去政治參與 (Rosenberg, 1954-1955; Mansbridge 1980)，Conover 與 Searing(1988)發現民眾深知政治討論的過程中可能會破壞人際和諧；Ulbig 與 Funk (1999) 發現具有衝突避免傾向的個體，傾向不去參與某些類型的政治參與。

然而，這裡有一個因果方向性的疑慮：到底是先避免衝突，才導致不參與政治，或者因為長期避免政治參與，而產生喜歡和諧的人際關係？針對這個質疑，Mutz(2002,845)指出，在統計結果上各種政治參與行為，和衝突避免、政治兩難呈現一致性的負相關外，她還認為長期「不去投票」或者「很晚做出投票給誰的決定」，並不會讓個體身處與旁人政治意見和諧融洽的環境中，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

至於另一個焦點元素「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的因果關係方向性是否有問題？則疑慮不大，筆者認為，說「個體因為不去政治參與，因而身處與周遭人政治意見一致的環境中」，聽起來是反直覺的 (counterintuitive)，一定是先有交叉壓力，才有政治不活動。

另一方面，政治活動充滿了衝突與對立，例如美國民眾對於政治的反感與缺乏興趣，來自於政治過程中充滿了嘈雜之聲 (Hibbing and Theiss-Morse, 1995, 2002)，特別是美國國會冗長、充滿對立、缺乏效率的立法過程，因此民眾對於政治過程中富含的衝突元素，不但促使民眾不信任政府，也使得民眾遠離政治參與 (Ulbig and Funk, 1999 引用 Hibbing and Theiss-Morse 在 1995 年的研究，解釋衝突避免與政治不活動的關聯性,)。但 Hibbing and Theiss-Morse(2005,227)認為，充滿衝突的政治過程本身沒有錯，好的公民需要認清政治總是在對立與折衝中擺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在 *Stealth*

⁴ Mutz 稱交叉壓力(cross-cutting exposure)所在的地方就是交叉網絡(cross-cutting networks)，請見 p.840 與 p.842

Democracy 一書(2002, 182)中, Hibbing and Theiss-Morse 認為一般公民參與社會團體與進行審議式參與⁵,「不見得」能增進集體決策品質(如投票結果)、增加政治治理系統的正當性,與增強公民參與者的素質。為什麼一般民眾進行審議式的政治參與不見得管用?第一、如前所述,民眾不喜歡政治參與混亂與衝突的本質,自然不願進一步審議。第二、鼓勵廣泛的社會與政治參與僅是物以類聚,參與過程中個體會往同質性,而非異質性政治立場的人去結社(也見 Berscheid and Reis 1998; Byrne 1997; Newcomb 1961; Boyden et al. 1984; Burlison and Samter 1996),反而造成社會隔閡甚至對立(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5, 233)。這一系列的研究總結民眾不喜歡政治參與是因為其有衝突的本質,若強迫大量的草根參與則對民主政治的發展不見得有利。

參、國內文獻

儘管衝突避免、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的研究,在國外已有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架構是否適用於台灣?能否為國內政治學界開啓一條類似的研究道路?是本文關注的焦點,國內政治學界運用台灣本土資料,已經有一些初步發現,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區隔「社會脈絡」與「個人政治討論脈絡」,發現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較社會脈絡更能預測投票行為;吳重禮、鄭文智與崔曉倩(2006)針對 2001 年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檢證「交叉網路」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發現身處低度交叉網路的選民,會比身處高度交叉網路的選民,更會參加競選期間之政治活動與參與投票。

林聰吉(2007)針對政治討論,也就是較容易受到交叉壓力抑制的政治參與種類做研究,他發現無配偶者,相較於有配偶者,容易因為政治討論而產生的立場歧異,而對投票卻步;Liu(劉正山, 2006)運用 2002 台灣民主化調查關於北高市長的選舉資料,研究交叉網絡對「投票改變」的影響,他稱交叉網絡為人際網絡異質性(the heterogeneit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而將「投票改變」定義為「上次與這次所投市長人選不同」與「所投的市長人選政黨背景與自己支持的政黨不同」,他發現北高兩市選民面臨到人際網絡中,旁人政黨支持與自己不一致的時候,選民容易改變投票行為;接續, Liu(劉正山)與 Chiu(邱師儀)(2011)運用台灣民主化調查 2006 年的資料,針對政黨背叛與政治棄權再做一次檢證,他們發現交叉網路與政黨背叛的連結具有實證支持,但是交叉網路卻無法預測政治棄權(不投票)。

張佑宗與趙珮如的研究主軸,探討到底是「社會網絡」,還是「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對於台灣選民的投票行為影響較大?作為國內政治學界有關於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研究的第一篇,他們的文獻多奠基於傳播學研究(2006, 9),並由文獻探討中,延伸出脈絡是強加於個人身上的建構,但網絡是個人主動建構的假設,他們發現家人立場的不同的確造成壓力,使受訪者不去投票,但是與鄰居政治偏好不同則沒有這方面的影響,「這可能是由於在現代社會中大多數人和鄰居較無往來,鄰居的看法與家人相比沒有那麼重要」(2006,22)。

與政治立場不同的朋友以及同事的互動,也有抑制投票的效果,但是仍以家人的交叉壓力影響最大。張佑宗與趙珮如突圍社會心理學與理性抉擇模式所產生的自變項較能詮釋政治參與的優勢,也以社會學變項-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與社會網絡-來預測投票參與?結果發現政黨偏好的解釋力還是最強(社會心理學變項),但是「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又優於「社會網絡」來的能夠預測投票棄權,顯見社會學變項仍具詮釋力。值得說明的是,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22, 見表十二)僅用「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度」來代表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而缺乏朋友、鄰居或者同事的政治討論網絡,似乎不完整,很有可能是因為台灣民主化調查對於這些政治討論網絡的問題多採跳題處理,因此產生樣本數不足的問題,所以才在模型中只採用互動頻率最高的「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度」來做測量。

吳重禮等人的研究(2006)與本文題目相近,但是該研究以交叉網絡之社會學變項,做為預測政治不活動的唯一焦

⁵ 感謝其中一位審查人給予的提醒與指導, Hibbing 與 Theiss-Morse 在該書第七章中,的確深入討論「一般民眾」進行審議式民主是否產生優點的迷思?審議式民主在他們的書中,並不專指政治菁英間的政治活動,而是一般民眾也可以進行的一種政治參與模式(deliberation among ordinary people, 該書第 172 頁),只是比起期望一般民眾投入審議的行列, Hibbing 與 Theiss-Morse 更推崇代議士民主的運行(見該書第 216 至 221 頁)。

點變項，本文則除了該變項之外，還多了一個測量內心避免衝突的社會心理學變項，此外，本文在文獻探討的部分，也多了一個從華人本土心理學「社會和諧觀」切入的文獻探討，吳重禮等人建構有序勝算對數模型（2006, 619），同時控制交叉社會網絡、政黨認同、族群認同、統獨立場、政治功效與政治知識等變項，仍舊發現低度交叉壓力與 2001 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期間從事政治活動的程度；低度交叉壓力與 2001 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投票參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結論中他們提及：

周遭的環境傳遞給他的是與其想法相左的資訊時，將使自己對於政黨、候選人、政治議題的判斷出現不確定性，導致他減少政治參與的可能性，這樣的**心理因素**稱之為政治矛盾心理。另一種因素係社會責任感，其使得選民在交叉網絡中，減少政治參與程度；亦即處於交叉網絡之下，個人所面對的問題並非是該支持哪一方，而是面對諸多爭議在支持哪一方都會有人反對之下，為了追求網絡同質的**人際和諧**，迫使個人拒絕表達自己的意見，因而降低了政治參與的動機（吳重禮等人, 2006, 623）。

儘管在此結論中，吳重禮等人提到了避免衝突的心理因素會降低政治參與的程度，但事實上他們只進行了外在環境交叉網絡與政治參與的檢證，模型之中並未包括社會心理學變項，也就是衝突避免的變項，此外，吳重禮等人也未理論化社會和諧詮釋政治不活動的關聯性，本文稍後補充。

林聰吉(2007)接續「社會凝聚」與「結構相等」的研究，前者指人們之間的政治影響力是建立在「親近」、「信任」、「尊重」與「互相關懷」，因此個體不管是對親人或非親人，因為社會凝聚、相濡以沫，彼此之間的政治影響力通常很大；後者則是出現在同一社交場所、居住同一社區、工作於同一機構的人們，彼此之間的政治意見也會趨於一致。林聰吉認為(2007,4)，就算在同一社會結構當中的人，沒有社會凝聚的親近感，政治意見也不易趨於一致，社會凝聚與結構相等互相補充，基此，他發現儘管配偶之間討論政治的頻率，沒有配偶各自與其他首要討論政治對象來的頻繁，但是配偶之間政治意見同意度卻是最高的（比如如配偶與各自同事、朋友、鄰居之間的同意度）。他發現配偶之間因政治立場歧異而產生的交叉壓力，會讓配偶放棄投票（幾乎達 $p < .05$ 水準，林聰吉 2007,15）；無配偶者也容易因為與朋友，鄰居、同事等政治立場歧異而不去投票，但無配偶者卻也同樣因為與朋友，鄰居、同事等政治立場接近而「提早決定投票對象」。

林聰吉的研究顯示，交叉壓力在台灣的樣本上，似乎對於單獨為之的政治參與種類-投票-仍有抑制的影響，只是對於無配偶者影響來得明顯一些，這點與 Huckfeldt (1979)、Giles 和 Dantico (1982)，與 Ulbig 與 Funk (1999,269) 對於只有互動式政治參與才受交叉壓力影響的假設不符，但與 Mutz (2002) 發現非互動式的政治參與如投票，也會受交叉壓力的影響相符。不管國內，抑或國外的文獻，在政治不參與，與交叉網絡和衝突避免是否產生正相關，依該參與是否具人際互動性質而定的面向上，所研究出來的結果仍舊分歧，再次說明本文就此進行檢測的動機。

肆、華人本土心理學的補充

前面提及 Mutz (2002) 與吳重禮等人 (2006) 觸碰到以社會心理學-衝突避免-的視角來理解交叉網絡，這與用社會學視角來理解交叉網絡是不同的，因此筆者投入這一部份的文獻充實。

對於衝突避免，或者說追求社會和諧的觀念，在華人心裡學中已有豐碩研究，華人的文化屬於集體主義 (Collectivism)，定義上包含幾個核心元素：「我們意識、集體認同、情緒依賴、群體團結、共享、責任與義務、需要穩定與預定的友誼、群體做決定，以及特殊主義」(Hofstede, 1991；齊力, 2003:115-45)，在華人社會中，強調人際和諧與團結，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黃曬莉, 2005: 533)；華人的集體主義，也可用「社會取向」(Social Orientation)加以理解(楊國樞, 1993)，華人在個體與個體的情感上，互相依賴並傾向壓抑自我與利益追求，個人在考慮他人感受的前提下，形成「自我的互依觀」(Interdependent View of Self)，相對於西方社會以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為文化核心的「自我的獨立觀」 (Independent View of the Self)(Markus & Kitayama, 1991: 568-579)。

也有研究(Hsu, 1981)詮釋華人生活方式，明白將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定義為「情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ness)，中國人時時刻刻對於與他人互動所產生的環境動態保持敏感，以免吃虧或者方便得利，不管是從社會取向、自我的互依觀、情境中心角度觀之，都可以看出華人是一個「考慮他人」的民族，而「和諧」遂為華人社會中顧慮他人所表現出最可欲的一種平衡(黃曬莉，2005)，而和諧的內涵就是「愛好和好、和睦、安和、崇尚和平、不喜歡抗爭、違逆、對立、競爭、鬥爭」(錢穆，1979；黃曬莉，2005: 529)，值得強調的是，集體主義構成元素之多，但其中之一包含「和諧」，這是概念性的定義(黃曬莉 2005；Leung, 1987 & 1988；Leung & Lind, 1986；楊中芳，1992)。

為從華人心理學的觀念重新認知一次「和諧元素」與「政治不活動」在理論上的鏈結，筆者引用華人社會「虛性和諧」的分析架構(黃曬莉，2005)，假設廣泛的政治參與會破壞一定程度的「虛性和諧」，由於政治參與的場域如街頭抗爭、參加競選造勢晚會、甚至是席宴間的政治討論，常常與不熟悉的人，或者是陌生人進行，因此密集的互動，反而容易破壞華人習慣「和而不同」⁶，或者更精確的說，「和而不接觸」的冷淡平衡，此乃虛性和諧，更詳細來說：

虛性的「疏離式和諧」所揭櫫的是一種表面的和諧，這是在實性投契式和諧已然不可能的情况下，以保持距離的淡然關係維持住一虛假的表面和諧，內心裡則不斷地退卻疏離，以求取一個對自我真誠的空間。通常，當事人面對價值觀不合的人，或賦予負面評價(如不喜歡、不欣賞、不服氣或看不順眼)的人，為了避免衝突，會以保持距離的方式，形式化的禮儀行為維繫一個淡然的和合關係。如果不幸與人發生衝突，疏離則是最佳的關係休止符...」(黃曬莉，2005: 549)

因此，華人的社會歧異不但不是重點，更是不可欲的，華人見到了政治場域中的歧異，為了避免明顯的輸贏並保持社會和諧，會選擇和稀泥(楊國樞，1993)，同樣的，政治參與場域充滿太多的對立與直接衝突，不管在口頭上，甚至是肢體上，所謂的「虛性和諧」也許提供一個在面對政治參與時的態度準則：就是疏離，因此和諧觀者會選擇政治不參與，儘管稍早台灣的文獻探討建議，交叉網絡並不只與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如政治討論)與有關聯，也與單獨為之的參與(如投票)有關聯，但從華人心理學「和諧觀」的部分來看，反而投票行為會因不需與他人互動而不易破壞和諧。

另一重點在於人際關係之中與誰互動？一起從事政治活動？是家人、朋友、鄰居還是同事？例如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用「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度」來測量個人政治討論網絡，也許感受到一般情形下，個體與家人互動頻繁，是個具預測力的自變項。林聰吉(2007)對於個體與家人互動的部分也多所著墨，現代人生活忙碌，朝夕相處最頻繁的是一星期工作五天的同事，與回家之後的家人(尤其是配偶與小孩)，朋友偶而聚聚，鄰居之間較農業時代的互動淡薄，也是不得不然的趨勢，因此筆者合理預測：與家人、同事與朋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一致而產生的交叉壓力，較能詮釋政治不活動，與鄰居之間產生的交叉壓力則不受影響。

重點是，個體比較在乎與家人、朋友，還是同事之間的政治歧異？這在理論上比較難以建構，屬於經驗上的問題(empirical question)，有可能儘管朋友不若家人與同事常見面，但個體比較在乎是否與朋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不愉快？林聰吉(2007)的確發現個體首要討論政治的對象(如朋友)，比與個體的配偶，在政治討論的頻率上來得高。而家人也有可能因為太熟了，儘管可能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疏於進行政治互動，例如政治討論，但不至於影響到政治參與如投票的決心與意向。

與同事之間可能只是互動頻繁，但不見得交心，類似「熟悉的陌生人」，所以縱然政治立場不同，假設上也只是避免就政治議題進行意見交換而已，但不會阻礙個體政治參與的意向。另一方面，由於衝突避免的心態上，如文獻探討，可能廣泛性的對各種政治不活動進行預測，因此筆者也做此假設。

⁶ 出自《論語·子路第十三》，註釋為「能與人和睦相處，但不盲目苟同」。

伍、政治知識、政治效能、統獨立場、政黨認同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除了本文的兩個焦點變項之外，這裡簡述政治興趣、政治效能、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性別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政治興趣促成政治參與是一個直觀的說法，也就是心理層面的興趣轉化為參與行為，盛治仁（2005）發現政治興趣高的人，會常收看電視 Call-in 節目；林瓊珠發現民眾若對選舉事務有興趣，其政治知識也隨之提升。

國外研究發現，政黨傾向與政治興趣成反比，獨立選民的政治興趣，會比政黨支持者低的多（Conway, 1991），由於政治興趣與各種政治參與種類的關係密切，因此研究常將政治興趣當成廣義政治參與的一種，視其為應變項（例如 Wu 2003, 758 的作法），然而也有研究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的學者將其視為控制變項之一（林聰吉 2007），由於政治興趣與政治參與關係密切，因此在後續的模型中控制政治興趣，有助於協助確定交叉壓力、衝突避免與政治不活動之間的切實關連。

政治效能的定義為「民眾信任與支持政府，並認為自己具有瞭解與影響政治事物的能力」（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187-189，也見黃信豪 2005, 2006），政治效能又分為內在效能感與外在效能感，前者指民眾認為自己有能力理解政治事務與政治過程，後者指民眾認為政府對於他們的需求有效反應。國外研究發現政治效能感高者，能夠導致較高程度的政治參與（Baker 1973；Pollock 1983；台灣的例子請見 Wu 2003）。黃信豪（2005）發現台灣民眾的內在效能感，是民眾競選活動相當重要的基礎；而台灣民眾的外在效能感高者，則傾向支持執政黨，大致與國外的研究發現一致，因此筆者期待內、外在效能感高者，參加政治活動的程度也高。

台灣特有的統獨議題，已是學界研究台灣民眾投票行為的焦點變項之一（例如陳陸輝 2000；盛杏媛 2002；鄭夙芬 2009）；也具有詮釋民眾參與政治的傾向，吳重禮等人（2006）發現在兩千年之後，由於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的執政，鼓舞了支持台灣獨立，或者傾向支持獨立的民眾去參與政治，對於支持統一者則無此傾向；然而 2008 年馬英九總統執政之後，是否對支持統一的民眾也具類似激勵參與的效果（由於本文的資料選取是在 2008 之後）？值得進行觀察。

張傳賢與黃紀（2011）認為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不見得劃上等號，只藉由政黨認同的連結，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才產生間接關係，他們還發現支持獨多於統的民眾，傾向支持綠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多於台灣人的民眾，傾向支持藍營，顯見「政黨認同」詮釋台灣政治現象的有效性。

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20）比較「交叉網絡」與「政黨認同」對於投票與否的影響力，發現後者比前者，更穩定有效預測投票行為；他們發現在 2004 年立委選舉當中，支持藍營者傾向去投票；支持綠營者則無此連結。吳重禮等人（2006）則在 2001 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資料中，發現支持泛藍與泛綠的選民，都傾向參加競選活動；林聰吉（2007）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因此筆者假設政黨傾向越強，參與政治活動的傾向越強。

性別方面，女性相較於男性，對政治較沒有興趣，並且政治參與的程度也較低（Verba, Sidney, Burns, and Scholozman 1997），因此本文期待男性相較於女性，較傾向政治參與。國外的文獻發現，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參與政治的傾向，主要是因為正規教育潛移默化民眾參與政治的技能（Stone and Schaffner 1988；Keith et al. 1992；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與國外不同的是，台灣受高等教育的民眾，反而比較容易遠離政治參與（林聰吉 2007），建議了學歷較高者對政治感到疏離的傾向，有可能是因為這個族群對政府的表現比較難感到滿意（陳世敏 1991；相關論述也見吳重禮等人 2006, 615）。總之，這些控制變項雖不是本文的焦點，但都是在研究台灣政治參與過程中相關變數。

陸、研究假設

基於文獻探討，本文有三項假設。

假設一：人際網絡的交叉壓力，驅動個體不去參與政治。

假設二：個體心中的衝突避免傾向，驅動個體不去參與政治。

假設三：與家人、朋友、同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的交叉壓力，會比與鄰居之間產生的交叉壓力，會來的容易

驅動個體不去參與政治。

原則上，本文的主要論述為「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皆會導致政治不活動（或者說導致政治不參與），儘管本文的假設一與二的用意，在辨別出這些假設的關連性，會不會因為政治參與具有人際互動性質而有不同？

在交叉壓力的部分，筆者期望見到的差異，主要是展現在「家人、朋友、同事」與「鄰居」之間，更細部來說，家人與朋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所導致的政治不參與是最明顯的，但由於家人可能太熟，與同事可能只是公務往返卻不見得交心，因此若與家人、同事政治立場不同，可能只是「不」交換政治意見，但不會影響到個體「最後仍要去投票」，或者「心意已決放棄投票」的決定。

至於社會心理學面向的避免衝突傾向，Mutz(2002)用「政治兩難」來代表「避免衝突」的概念，發現與「單獨為之」的投票行為呈現反比關係，也就是說，不管政治參與是否在社會互動情形下進行？避免衝突的個體傾向與各式各樣的參與呈現反比，因此筆者假設：個體心中的衝突避免傾向，驅動廣泛的政治不活動。

質言之，這三組假設涉及到三個重點，第一、除了交叉壓力，還有衝突避免這個「政治不活動」的詮釋項；第二、政治參與種類是否涉及人際互動，會不會造成差別？第三、與誰互動以進行政治參與，會不會造成差別？

柒、資料選取

筆者採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獨立樣本）」（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or TEDS）之問卷資料（有效樣本數為1238份），TEDS資料之多，筆者只選取此年度資料，主要是因為歷屆TEDS多未「同時」列入有關「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題目；或者是問到討論政治對象的問題，卻沒問到受訪者是否支持不同政黨的問題，因此無法測試與鄰居/朋友/家人/同事支持不同政黨，是否導致不與他們討論政治的關聯性？

唯一同時問到「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題目，還有2001年立委選舉面訪，該問卷包含「與誰討論政治議題」與「討論政治的對象所支持政黨相同」兩個題組，可以構成交叉壓力測量，另一方面也問到受訪者對於「大家的想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就會不安定」論述的贊成程度，與對於「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影響到這個地方的安定與和諧」論述的贊成程度，可以作為社會和諧觀的測量，不過這些題組距今已有10年歷史，因此筆者決定採用較近、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

又由於2001年立委選舉面訪有關於衝突避免的題目，與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有關衝突避免的題目測量不同，因此筆者難以進行2001年與2008年的「合併橫斷面資料」分析(pooled cross-sectional analysis)。另外，「2008年總統選舉面訪資料」有問到政治討論對象的問題，也問到有關社會和諧的問題，但卻沒問到受訪者與政治討論對象政黨支持是否一致的題目，因此無法做到前述，去檢證「政黨支持不同」，是否導致「政治不討論」？比較優劣之後，筆者決定使用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

當中有關於交叉壓力的測量題組包括：

您與您家人/朋友/鄰居/同事支持的政黨是不是相同？

- 答案有：
1. 我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2. 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3. 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
 4. 我並不了解他們支持的政黨

由於第一個選項是均質的政黨支持，編碼為1；其次為「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編碼為2；最異質性的為「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編碼為3；由於第四個選項提供資訊有限，因此編碼為系統遺失，如此編碼將這個「交叉壓力」安排為順序變項。同時，與這個交叉壓力相對應的政治參與變項為「政治討論」，為：

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後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編碼為4）、有時討論（編碼為3）、

很少討論(編碼為 2)、還是從來不討論(編碼為 1)，筆者將此政治討論變項視為區間變項，預計採用「最小平方法」(ordinal least squares)，主因是此變項對於自變項的反應將更敏感。

至於本文另一焦點變項「衝突避免」，與外在環境的交叉壓力測量不同，屬內心層面，共有兩個測量：

第一個，當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其他家人不同時，有人認為：「應該隱藏自己真實態度」；但也有人認為：「應該真實的表達」。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前者編碼為 1，後者編碼為 0。

第二個測量為：由於台灣政治競爭激烈，請問您是否會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擾？答案有四個程度：非常擔心；有點擔心；不太擔心；一點都不擔心，由左至右依序編碼為 4、3、2、1。這兩個衝突避免測量，在模型中，將分別並列為兩個變項，與合併成一個變項來檢證（兩個變項間相關性為.22； $p < .001$ ），如此一來，可以看出特定衝突避免測量是否能預測政治不活動？也可以看出合併成一個綜合概念是否有同樣的效果？

其中政治參與的種類，包含了有沒有在立委選舉中投票？有沒有投政黨票？延遲多久決定投票⁷？有沒有替候選人向家人、親戚、朋友、鄰居、同事拉票？總的說，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運用在此研究的政治參與變項計有：政治討論、投立委票、投政黨票、延遲投票、拉票等五種，惟如果筆者能測試其他政治參與種類，如「參加競選造勢晚會」，則能更完整，不過由於該年度沒有包括這些種類政治參與問題，因此這五種為主。

況且這五種參與種類，已足夠用來判定個人為之（投票類）與互動為之（拉票、政治討論）的政治參與，是否受到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差別影響」？

為預防焦點變項與政治參與之間的虛偽關係，在模型中控制了內在效能感，由「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與外在效能感「政治有時太複雜，我們一般民眾實在搞不懂」與「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其他還有「政治興趣」，也就是詢問「您對政治的事感不感興趣」的程度？「統獨傾向」以「統一」與「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兩個選項合併為「統一」，與「獨立」與「維持現狀以後獨立兩個選項」兩個選項合併為「獨立」，來與維持現狀作對比；「政黨認同」以泛藍或者泛綠對比「不屬於任何一邊」；其他還控制教育程度與性別，詳細的變項題目請見附錄。

捌、結果分析

首先我們就社會互動性的政治參與-討論政治，來檢視其是否受交叉網絡的影響？表一呈現單因子變數分析(one-way ANOVA)，結果顯示，「受訪者與他們支持的政黨相同」、「受訪者與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與「他們支持的政黨都不相同」，在抑制政治討論的頻率上，展現由弱到強的程度，當然在與朋友和與鄰居討論政治的頻繁度上有些例外，因為對於這兩種政治討論對象，受訪者感覺到「自己與他們支持的政黨不同」，並沒有比受訪者感覺到「他們支持的政黨都不相同」，而來得討論頻率高一些，反而是低一些。

另一方面，在與家人和同事的討論政治頻繁度方面，交叉網絡弱到強的順序性則顯現無疑，儘管如此，從雪菲後測可以看出，受訪者感受到朋友與鄰居與自己支持相同政黨時，會比起受訪者感受到朋友與鄰居支持的政黨都不相同時，來得更容易討論政治（皆顯著在 $p < .10$ 的層級），仍舊見到不同程度交叉壓力所產生的不同效應。

[表一在此]

表一的結果也暗示了交叉壓力影響最鮮明，是在與家人及同事討論政治的時候，其次是對朋友與鄰居討論政治時，符合文獻探討時，提及個體與家人和同事相處時間最長，上班面對同事，下班面對家人，幾乎佔掉整天的時間。此外，個體與朋友完全一樣的政黨支持，比起和朋友之間的政黨支持全不相同時，對於政治討論的影響仍舊有差別。值得注

⁷ 請問您何時決定投給該立委候選人？很早已前就決定；兩個月以前決定；一個月以前決定；兩星期之前決定；投票前一兩天決定；投票當天決定。

意的是，因為政黨支持的不同而導致不去討論政治，有可能只是面對歧異的政治言論環境，多談會遭來外在壓力，而不願去談；但不願去談也不見得影響個體仍要挺身投票的決定，與要把票投給誰的決定，換句話說，交叉網絡在進一步檢證前，仍有可能導致其他種類的政治參與。總之，表一建議交叉網絡的影響，在單因子變數分析的測試下，及尚未控制其他變項情形下，有抑制政治討論的趨勢。

表二的模型對於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進行更全面的檢證，並且還加入另一個焦點變項：衝突避免，並控制政治參與常見變項，包含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與性別。在討論結果之前，必須先說明的是，由於只有受訪者「有效」回答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政治的頻繁程度為何之後，受訪者才能進階回答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之間有沒有交叉壓力的問題？如果受訪者選擇「從來不與這些對象討論政治」，則這些受訪者就被要求略過交叉壓力的問題而不需回答，造成許多遺漏值，這個情況尤其在與鄰居有關的問題上，產生許多遺漏值，在有效樣本數為 1238 份的情形下，與鄰居討論政治的樣本數掉到 282 份，與鄰居支持政黨不一致的樣本更是掉到 168 份；其他像與同事討論政治的樣本數也掉到 528 份，與同事支持政黨的樣本數掉到 368 份，若要以這些樣本進行統計分析，在應變項為投票、延遲投票、拉票和與鄰居討論政治的迴歸模型中，樣本數依序掉到了 64、52、64 與 132 份，對於推估母體恐怕失真。

為此，作者使用多重插補法 (imputation) 來彌補這個缺憾⁸，多重插補法的意義不在於找回原先遺漏值，而是希望依照模擬 (stimulation) 的方式，產生有效的統計估計 (Rubin 1987, 1996)，其假設為「遺漏值的產生必須是隨機的」，進一步來說，本文所用資料所含的遺漏值為 Missing At Random 或 MAR，也就是「因受觀察值影響而產生遺漏值，但不因未受觀察值影響而產生遺漏值」的情形；因為有關於交叉壓力題組的遺漏值，由受訪者回答政治討論題組時給予「從不討論政治」答案而來，研究發現 (Rubin 1976)，若出現 MAR 的問題時，若使用常見的「成批刪除法」(listwise deletion) 來處理遺漏值，會產生嚴重的估計偏差 (Rubin 1987)，由於 MAR 當中的遺漏值只是因為受訪者失去回答特定問題的機會，因此不含特殊意義，適宜使用多重插補法來模擬原來的資料分佈。經過多重插補法，新的模型不但與原先未插補前的模型在統計結果上差異極小，前述的複迴歸模型中的樣本數，也回到了 578 至 834 之間。

[表二在此]

表二當中交叉壓力對於各類政治參與的預測力顯得很零星，比較突兀的是與同事支持不同的政黨，反而導致投票行為，與同事支持政黨不同也不會「延遲投票」與「放棄拉票」，顯見身處雜質的政治網絡環境，反而在工作場所激起投票行為，就此發現而言，與 1970 年代在美國交叉壓力的研究相符 (見 Knoke 1990)。另一方面，與朋友支持不同的政黨，顯著地延遲決定投給哪一位立委候選人的時間 ($p < .05$)，也傾向不去為自己喜歡的立委候選人拉票 ($p < .05$)，顯示了在與各種不同對象所產生的交叉壓力當中，與朋友之間的交叉壓力最能詮釋政治不活動。

一方面，與同事與鄰居間的交叉壓力無法讓受訪者放棄投票、延遲投票與向人拉票；另一方面，從表一到表二有關於政治討論的部分，與同事與鄰居間的交叉壓力，反而降低受訪者與他們討論政治的頻率，這種關聯性在表二第二部分控制其他變項後，仍呈現顯著。至少在 2008 年這波民調中，顯見民眾對於鄰居與同事若在政治立場上「道不同不相為謀，各行其是」，也就不會討論政治，與同事之間的交叉壓力還會激起投票慾望，由此一方向推敲，頗有因為投票是個人為之的行為，因此不需如討論政治一樣的互動，所以不受交叉壓力導致政治不活動的影響，與 Huckfeldt (1979) 與 Giles 和 Dantico (1982) 等人對於社會互動 v. 個人為之參與行動的分野的發現接軌。總之，與同事支持不同政黨的部分，與本文的假設一不相符；但是與朋友支持不同政黨的部分，與假設一是相符的。

⁸如何處理遺漏值的問題，已有豐碩的研究，最新的文獻請見 White, I.R., P. Royston, and A. M. Wood. (2011). "Multiple imputation using chained equations: Issues and guidance for practice." *Statistics in Medicine* 30: 377-399. 與 Royston, P., J. B. Carlin and I. R. White(2009). "Multiple imputation of missing values: New features for mim." *Stata Journal* 9: 252-264.

表二的第二個部分，不管是與家人、朋友、鄰居還是同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的確都降低討論政治的頻率，而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的部分，幾乎在 $p < .10$ 的層級顯著，由於在表二第一部分，與朋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導致延遲投票與放棄拉票，符合假設一，因此有必要稍後進一步，探索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所產生的交叉壓力，和與朋友討論政治頻率的關係。總體來說，交叉壓力抑制政治討論的效果，不管對誰都有一致的因果關聯性出現。

接下來是本文第二個焦點變項：衝突避免。衝突避免的變項由兩個題目構成：「當受訪者政治立場與家人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的態度，或應該真實的表達」與「由於台灣政治競爭激烈，受訪者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擾的程度」，假設二為個體心中的避免衝突傾向，驅動個體不去參與政治，這樣的假設在「立委投票」以及「延遲投不分區投票時間」兩自變項的部分未被接受。

但「衝突避免」這個合併變項，卻顯著地詮釋延遲投票給立委參選人的部分，但未在投不分區票的部分見到關聯性，有可能是因為「政黨票」比起區域立委在社會上的知名度低很多。若將衝突避免拆開來看，選擇「當政治立場與家人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的態度（表中以「隱藏真實態度」表示）」的人，傾向放棄為自己喜愛的立委候選人拉票。選擇「台灣政治競爭激烈，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擾的程度（表中以「擔心政治立場」表示）」的受訪者，傾向延後決定立委候選人投給誰的時間。

總體而言，若不考慮較引不起社會大眾注意、延遲投政黨票之應變項的話，衝突避免的變項只預測到了對立委的延遲投票，與針對所支持立委候選人的拉票行為。另一方面，衝突避免與投票（立委）無統計上的關聯性，似乎建議了：到了投票時刻，進了票匭屬於個人的秘密行為，與內心的衝突避免矛盾不大。另一方面，如果衝突避免的確延遲了對立委的投票時間，表二將衝突避免拆成兩個元素的結果建議，主因可能是擔心「自己或家人因外在政治環境競爭激烈，而遭致不必要的困擾」，換言之，投票可能還是一個「個體為之」，並且與「衝突避免」不扞格的行為，但是當投票的行為牽連到了個體擔心外界紛擾的政治競爭時，則會產生延遲投票的情形，譬如說某甲長期以來投給綠營候選人的形象鮮明，旁人或多或少知道，那有可能某甲因為意識到外界的紛擾，而產生延遲投區域立委票的情形。

同樣的，拉票屬於互動性質極高的政治參與，不會進行廣泛性拉票行為（不只針對家人拉票）的原因，表二顯示由「與家人政治立場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的態度」所引起，綜合表二第二部分「與家人支持政黨不同，則傾向不與家人討論政治」與「衝突避免的想法不會防止個體與家人討論政治」，筆者合理推測：與家人的政治立場不同，會關閉對外拉票的心理機制，可能是由於避免衝突的想法發酵所致；但這個衝突避免的想法，不是針對家人，而是針對外人；儘管與家人支持政黨不同，會導致不想與家人討論政治，但表二第二部份也告訴我們這不是由衝突避免所引起，有可能只是沒有溝通的興致而已。

與家人和鄰居討論政治

以衝突避免(而非交叉壓力)來預測政治討論，結果更依對象不同而有不同，而且呈現很分明的區別，不管是合併變項，或者是分開變項的形式來呈現，衝突避免都無法詮釋「與家人討論政治的頻率」與「與同事討論政治的頻率」，誠如文獻探討提及，家人可能因為太熟悉，所以內心裡的衝突避免，不至於阻礙到與家人討論政治的興致。

誠如前面所述，與家人支持政黨不同顯著地 ($p > .01$) 驅使受訪者避免與家人討論政治，顯示出與家人政治立場不同，燃不起談話的動力，但不是因為避免衝突的內心憂慮。在未放進本文的模型中，筆者製造了一個「衝突避免（合併變項）X 與家人政黨支持不同」的交互變項，結果發現交互變項未顯著，衝突避免也未顯著，只有「與家人政黨支持不同」顯著在 $p < .10$ 的層級，顯示「交叉壓力」詮釋「與家人討論政治的頻率」上，不因「衝突避免」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衝突避免也詮釋不了與鄰居的討論政治，與和家人政治討論部分類似，與鄰居支持政黨的不同會導致受訪者避免與其討論政治，相當合理，但衝突避免的變項則與鄰居討論變項產生不了連繫，額外測試的交叉變項（也未放進文中）

也不顯著，也許是因為鄰里之間的關係相對冷淡，如果說家人是太熟的而忽略的話，則鄰居則是因為陌生而在討論政治的層面上忽略他們。

與朋友和同事討論政治

在討論「交叉網絡」的部分，提及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會導致延遲投票（立委）與拉票，筆者主張在政治參與的過程中，與朋友的「相處時間」也許不若與家人與同事多⁹，但是重質不重量，表二第二部分雖然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並沒有顯著，但是進一步的交互變項的測試卻呈現頗為有趣的關係，依照迴歸係數，方程式表現如下，在此方程式中，不但交叉壓力（ $p < .01$ ）與衝突避免（ $p < .01$ ）的變項顯著，這兩個變項交乘的變項（ $p < .05$ ）也顯著。在控制表二有的其他變項之後，這三個變項仍舊顯著在.01、.05與.10的層級，可以說統計關聯性相當堅定。

$$\mu^y = 2.14 - .232(\text{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 - .162(\text{擔心衝突}) + .053(\text{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 \times (\text{擔心表達政治立場受困擾})$$

μ^y = 與朋友討論政治的頻率

[圖一在此]

由於交互變項呈現正相關，暗示「與朋友支持不同政黨的度」和「與朋友討論政治的頻率」在「擔心衝突」為特定值的時候，呈現正相關，圖一協助釐清這樣的關係，如果把受訪者依「擔心衝突」程度不同分為高、中、低組，圖一顯示當「高度擔憂組」與朋友的政黨支持不同程度「由低到中度」的時候，反而逐漸增加與朋友政治討論的頻率，但是當政黨支持歧異極大化時，討論的頻率就降了下來。「中度擔憂組」則是隨著與朋友政黨支持程度漸漸變大，而逐漸不願意討論政治。「低度擔憂組」反而是在與朋友支持政黨支持差異還不大的時候，對朋友間的政治討論興趣缺缺，而政黨支持差異極大化後（交叉網絡壓力極大化），交叉網絡激起了政治討論的頻率，既然這組名為「低度」擔憂組，即不畏懼交叉壓力而談談政治，邏輯上也不難理解。總的來說，在研究與朋友間的政治討論時，內在的社會心理變項與外在的社會學變項，起了交乘作用，也讓交叉網絡與衝突避免是不是導致「政治不討論」？依不同情形而有不同的回答。

表二中「與同事間支持政黨不同」與「衝突避免」的變項，雙雙詮釋了避免與同事討論政治的結果，同樣的在額外測試的交互變項中，前述這兩個變項並未呈現統計上的顯著，綜合前面發現與同事支持政黨不同，反而會導致投票，可以說個體與同事的關係雖然因公務密切互動，但在政治討論的互動上，遇到不同立場的同事時，則是能避免談論就避免談論；害怕衝突的心態，也讓個體傾向不與同事談政治；不過不說並不代表不參與，遇到立場不同的同事時，反而激起在立委選舉票區中投下神聖一票的決定。

至此，總結三項發現：

- 第一、個人為之的參與活動（投票），似乎比起互動型的政治參與（拉票），較不受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影響，這點反而與 Mutz（2002）等人所做的研究有所出入。也對本文假設一與二產生端視參與種類而決定是否支持的結果。
- 第二、個體因朋友政治立場不同，傾向延遲投票、不去拉票、不與朋友討論政治，比起因同事、家人、鄰居政治立場不同，更能預測政治不活動。與家人政治立場不同，則引不起討論政治的興趣，但這不是因為避免衝突的內心傾向。身旁有立場不同的同事，則是避免涉入討論政治，但反而激起投票決定。與政治立場不同的人做鄰居，則較不受影響。這個發現大致與假設三穩合。

⁹ 在未顯示的描述性統計中，與家人時常討論與有時討論政治的受訪者佔 33.84%；與朋友則為 29.48%；與鄰居為 6.95%；與同事為 22.13%。但這些資訊不代表個體與這些對象相處時間的長短。

第三、最不擔憂衝突的受訪者，反而在與朋友之間政治歧異程度由中度到強度時，增加與朋友政治討論的行為，這種關聯性，也類似因同事政治立場不同而刺激投票一樣，這與交叉網絡研究一脈相承詮釋政治不活動的方向有所違背，高度擔憂者則隨著與朋友政治立場極大時，而顯得不願意與之談論政治，中度組則沒有這些區段上的分野。

至於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與性別等控制變項。

在表二當中有政治興趣者，傾向在立委選舉中投票；與在同樣選舉中投下政黨票；同時也不會延遲投票時間；傾向拉票；傾向與家人、朋友、鄰居與同事討論政治，一如文獻探討，政治興趣是預測力相當一致且有效的自變項。內在效能感與外在效能感在除了「政治討論」的政治參與項目，皆未達預測效果。外在效能感較高者則傾向與朋友與鄰居討論政治；內在效能感即使在政治討論的部分也無法展現其預測力，可以說「認為政府會對自己需求有所反應的民眾」，只有對半數政治討論應變項，展現作為政治效能感的詮釋力。

與吳重禮等人發現的相同（2006），傾向獨派的民眾在政治參與上，相較於維持現狀的民眾，較容易參與政治，包含較易投立委票與政黨票，比較容易拉票與傾向不拖延投票時間；傾向統一的民眾，對比傾向維持現狀的民眾，則無此連結。顯見偏獨派的民眾傾向在選舉代表時發聲的本質。政治討論則是一種特殊性質的參與，不但獨或統的傾向與其不產生關連性，傾向統一者甚至不與家人討論政治，也許台灣獨立支持者，比較看重政治參與的行動性，避免「光說不練」。

在表一的第一個部分，一般而言政黨認同是一個詮釋力強的變項，泛藍者傾向投區域立委票與政黨票；不但不會延遲投票，還會替自己喜愛的候選人拉票；泛綠的支持者，則是不會延遲不分區投票時程，也會幫忙拉票。泛藍支持者也會涉入廣泛的政治討論（與家人、鄰居、同事）；泛綠支持者，相較不屬於任何一邊者，只傾向與家人討論政治，與「獨比統活躍」剛好相反的是，似乎「泛藍選民比泛綠選民還要活躍」，顯見政黨支持與統獨立場，在詮釋政治參與時不必然一致的情形。

教育程度在參照小學畢業及以下的對比時，有學歷越高越不願參與政治的情形，擁有大學及以上學歷者，尤其有這種政治不活動的傾向，大學畢業者不投票，也延遲投票；普遍不與朋友、鄰居與同事討論政治。可能由於台灣民主離成熟尚有一段距離，學歷高者的政治品味較高，不易滿足政治現狀，也不易被政治人物動員而去參與；也可能因為學歷高相對成就高，生活比較忙碌，因此無暇參與政治。最後，台灣男性並沒有比起女性在政治參與的部分更活躍，除了男性比女性更會與朋友與鄰居討論政治之外。表二的各個模型中，依應變項為二元或者區間變項，則顯示 Pseudo R 平方或者是調整後的 R 平方，所有自變項詮釋應變項變量的程度，至低將近 7%，至高有 31%，差補法對模型解釋力的提升，有顯著幫助。

玖、結論與建議

本文在交叉壓力相關文獻上，做了四點補充，第一、以社會心理學的面向來看交叉壓力，也就是加入了衝突避免的變項；第二、為單獨為之的政治參與種類（主要是投票），是否不受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的影響，做了一次檢證；第三、檢視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對於各種政治參與的影響，有沒有交互影響的關係？最後，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因政治立場不同，所產生的交叉壓力，會不會影響到個體與他們討論政治的頻率？又個體本身對於衝突避免的心態，會不會影響到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的政治討論的頻率呢？

為呼應前言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做以下簡短回答，首先，本文首次嘗試將國外有關於衝突避免的測量也納入模型中，並同時與交叉壓力作為兩個詮釋政治參與的變項，發現衝突避免的社會心理狀態，對於個別為之的政治參與，主要是指投票，並沒有影響，同樣的，交叉壓力也對投票棄權影響有限，符合了國外研究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直及社會

互動型政治參與的發現，但也與 Mutz (2002) 等人的研究不相符。就社會互動型的政治參與，主要是拉票而言，與家人政治立場不同而衍生的衝突避免心態，的確會抑制拉票行爲；在交叉壓力的部分，只有與朋友支持政黨的不同，才會抑制拉票行爲。

再者，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只有對與朋友討論政治時才會出現互動的關係；對低度擔憂政治立場衝突的人來說，面對政治立場歧異極大化時，反而刺激與朋友討論政治的頻率，說明了言論的多元性，甚至衝突性，對某些群體而言，並不會產生「寒蟬效應」，也就是爲怕衝突而不敢說話的情況；尤其本文發現，「朋友」是個體在涉及政治參與行爲時，具有影響個體最終是否仍舊願意參與的一個重要對象，其重要性甚至不輸家人，與其他文獻（張佑宗與趙珮如 2006；林聰吉 2007）在研究交叉壓力時，以家人爲產生壓力的主要來源有些許不同。

而衝突避免的心態，也不是對於任何政治討論對象，皆有預測「不去政治討論」的效果，主要是對朋友與對同事，個體可能因爲畏懼政治立場不同所產生的衝突，而傾向不與他們討論政治。比較有趣的是，個體對於與同事與鄰居的政治立場歧異，只會導致不與之接觸討論政治而已，並不會因此而放棄投票、放棄拉票，與延遲投票，對者兩種政治立場不同對象，不去討論政治也不是因爲衝突避免的心態所致。本文接續先前的文獻，加深並完整描述這些對象在交叉壓力情形下，各自扮演何種角色？

當然本文也有許多可以加強的地方，不過這些部分多半來自於統計資料的限制性。第一，有鑑於 TEDS 的資料包括，有時又不包括「衝突避免」的測量（TEDS 中常以民眾對多元意見的態度爲標題置放這類測量），再者，有類似測量時，問的問題又常不同，因此難以合併資料做處理，讓樣本數變大，既然 TEDS 陸陸續續已有四組衝突避免的問題，筆者淺見以爲能在大選年同時放個題目，分別爲：

1. 「大家的想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就會不安定」的贊成程度。
2. 「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影響到這個地方的安定與和諧」的贊成程度。
3. 「當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其他家人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態度，或者應該真實表達」的衡量判斷。
4. 「由於台灣政治競爭激烈，是否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困擾」的贊成程度。

同時有這四個測量，可進一步進行因素分析，產生信度更高的衝突避免變項。

第二、由於本文所運用的資料，爲對立委選舉來自於立委選舉，有可能因爲如此，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未能預測相關的政治參與變項，由於立委選舉的受矚目性，沒有總統大選來的高，將來研究可以盡快對再做總統大選資料再做檢證。第三、由於交叉壓力測量跳題的設計，讓許多從事交叉壓力的研究者，爲整理資料後稀少的樣本數所惱，當然資料差補法可以是一個合理的推估工具，但如果將跳題的部分拿掉，可以藉由面訪協助受訪者瀏覽相關題目，則樣本數會更多一點；或者配合第一個改進方式，讓大選年問卷的衝突避免與交叉分析的題目都一致且完整，則可以藉由跨年資料的合併來提高樣本數。

最後、需在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題目的同時，有加入各式各樣，尤其涉及到社會互動的政治參與的問卷題目，這樣對照起個人爲之的參與活動，如投票參與，則更能完整比較。政治參與是民主的基礎，儘管政治不活動可能也是表意的一種方式，但若因爲群體壓力，或害怕衝突而造成參與棄權的話，則吾人必須思考民主多元聲音，但多元聲音卻又抑制民主必須的政治參與之間的矛盾，一個容忍異己，尊重多元，卻又樂意在參與中求同的公民文化，也許是台灣努力不懈的目標。

附錄

表一：「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政治」與「自己與他們支持的政黨相同與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與家人討論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朋友討論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鄰居討論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同事討論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1. 受訪者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1.70	1.71	1.67	1.89
2. 受訪者與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	1.53	1.55	1.37	1.64
3. 他們支持的政黨都不相同	1.46	1.56	1.40	1.47
N	706	552	168	367

題目為：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論（編碼為 3）、有時討論（編碼為 2）、還是很少討論（編碼為 1）？

雪菲後測（Scheffe post-hoc test）

家人方面：1>2 ($p<.05$)；1>3 ($p<.01$)

朋友方面：1>2($p<.10$)；1>3($p<.10$)

鄰居方面：1>2($p<.10$)差點 $p<.5$ ；1>3($p<.10$)

同事方面：1>2 ($p<.05$)；1>3 ($p<.01$)

表二

表：交叉壓力、衝突避免預測政治參與（第一部份）

自變項\依變項	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不分區)		拉票 (立委)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交叉壓力								
與家人支持政黨 不同	-.138	.150	.189	.140	.241	.135#	-.113	.227
與朋友支持政黨 不同	-.170	.154	.330	.133*	.158	.129	-.430	.201*
與鄰居支持政黨 不同	.186	.282	-.135	.223	-.166	.211	.348	.328
與同事支持政黨 不同	.394	.187*	-.022	.154	.189	.149	.133	.245
衝突避免								
隱藏真實態度	-.037	.185	.119	.172	-.009	.168	-.760	.315*
擔心政治立場 (若合併變項)	-.039	.090	.167	.084*	.017	.081	.051	.132
	-.038	.072	.156	.069*	.011	.067	-.111	.111
政治興趣	.358	.079**	-.173	.073*	-.312	.071**	.565	.126**
內在效能感	.067	.081	-.015	.076	-.079	.073	.029	.114
外在效能感	.080	.056	.074	.050	.078	.048	-.005	.080
統獨立場 (參照維持現狀)								
傾向統一	.228	.240	-.045	.211	-.130	.205	.214	.331
傾向獨立	.495	.234*	-.624	.214**	-.666	.209**	.673	.336*
政黨認同 (參照不屬於任何一邊)								
泛藍	.785	.214**	-.723	.188**	-1.278	.182**	1.508	.341**
泛綠	.087	.237	-.289	.228	-.865	.219**	1.203	.378**
教育程度 (參照小學及以下)								
國初中	-.278	.377	.047	.298	.018	.290	.642	.487
高中職	-.625	.334#	.174	.262	.162	.254	.486	.436
專科	-.708	.362#	.438	.296	.395	.286	-.232	.516
大學以上	-1.26	.327**	.836	.267**	.775	.258**	-.539	.466
男性								
常數項	-.066	.173	-.129	.161	.076	.155	-.132	.253
	-.674	.793	2.160	.661**	3.14	.639**	-5.047	1.091**

N	834	592	578	775
Pseudo R ² 或 Adjusted R ²	.078	.096	.191	.177

交叉壓力、衝突避免預測政治參與 (第二部分)

自變項\依變項	與家人討論政治		與朋友討論政治		與鄰居討論政治		與同事討論政治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交叉壓力								
與家人支持政黨不同	-.090	.034**						
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			-.042	.029				
與鄰居支持政黨不同					-.097	.028**		
與同事支持政黨不同							-.204	.029**
衝突避免								
隱藏真實態度	-.056	.042	-.068	.039#	-.011	.021	-.070	.033*
擔心政治立場	-.008	.020	-.047	.019*	-.004	.010	-.050	.016**
(若合併變項)	-.019	.016	-.052	.015**	-.006	.008	-.054	.013**
政治興趣	.166	.017**	.149	.016**	.076	.008**	.121	.013**
內在效能	-.025	.018	-.006	.017	-.014	.009	-.021	.014
外在效能	.002	.012	-.025	.011*	.073	.006**	.001	.009
統獨立場(參照維持現狀)								
傾向統一	-.120	.053*	.049	.049	-.029	.026	.051	.041
傾向獨立	-.034	.052	.052	.049	.014	.026	-.011	.040
政黨認同(參照不屬於任何邊)								
泛藍	.080	.045#	.066	.042	.103	.023**	.085	.035*
泛綠	.177	.054**	.081	.051	.043	.027	.065	.042
教育程度(參照小學及以下)								
國初中	.014	.077	.063	.072	.020	.038	-.101	.060#
高中職	.105	.068	.016	.064	-.031	.034	-.079	.053
專科	.104	.075	-.089	.071	-.060	.037	-.191	.058**
大學以上	.073	.067	-.199	.063**	-.141	.033**	-.249	.052**
男性	-.043	.038	.128	.036**	.112	.019**	.034	.030
常數項	1.258	.124**	1.403	.117**	.910	.079**	1.906	.103**
N		836		836		836		836
Pseudo R ² 或		.149		.170		.310		.232
Adjusted R 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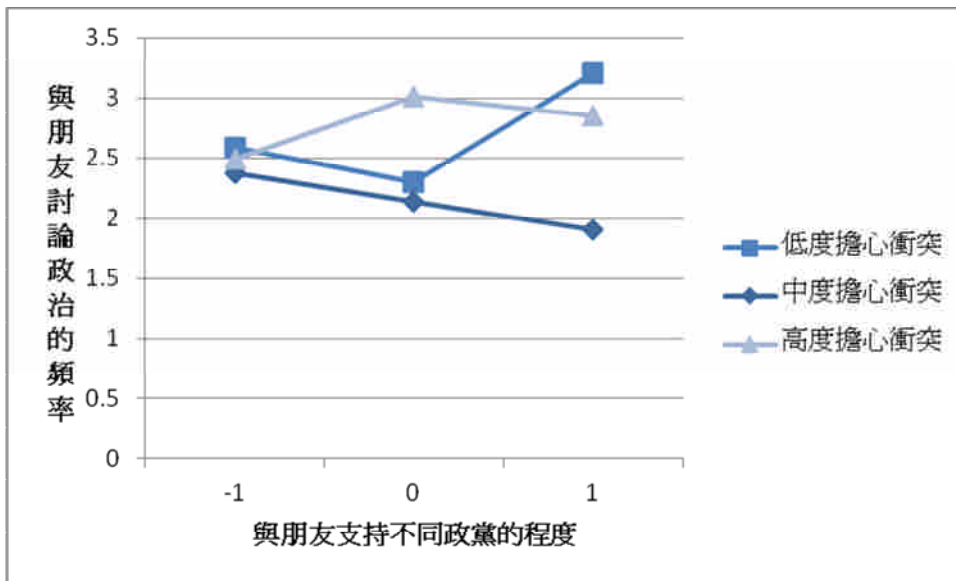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TEDS2008L

說明：#：<0.10 *：<0.05 **：<0.01

衝突避免之兩個測量題目，分別「當受訪者政治立場與家人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的態度，或應該真實的表達」與「由於台灣政治競爭激烈，受訪者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擾的程度」。

若合併變項為如果講這兩個測量相加起來，變成單一變項的方式。

圖一



參考文獻

- 徐火炎(1991)。〈政黨認同與投票抉擇：台灣地區選民對政黨印象、偏好與黨派投票行為之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四卷，第1期，頁1-57。
- 吳乃德(1992)。〈國家認同與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4期，頁33-60
- 劉義周(1994)。〈台灣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選舉研究》，第1卷，第1期，頁53-73。
-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第7卷，第2期，頁109-41
- 林瓊珠(2005)。〈台灣民眾的政治知識：1992~2000年的變動〉，《選舉研究》，第十二卷第一期，頁147-171。
- 盛治仁(2005)。「電視談話性節目研究——來賓、議題結構及閱聽人特質分析」，《新聞學研究》，84: 163-203。
- 徐火炎(2006)。「台灣的公民權：經驗內涵的初探」，發表於「公民權：台灣社會基本調查第八次研討會」，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國際會議廳，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籌備處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
- 黃信豪(2006)。「政治功效意識的行動效果：1998-2003」，《台灣民主季刊》，第3卷第2期，頁119-158。
- 鄭夙芬(2009)。「族群、認同與總統選舉投票抉擇」，《選舉研究》，第十六卷第二期,頁23-49。
- 張傳賢與黃紀(2011)。「政黨競爭與台灣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的聯結」，《台灣政治學刊》，第十五卷第一期，頁3-71。
- 陳世敏(1991)。「民意調查與台灣的民主化：以施政滿意度和公眾人物的聲望調查為例」，《新聞學研究》45：101-118。
- 王叢桂(2005)。「華人價值研究」，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633-64。臺北：遠流出版社。

- (Chung-kuai Wang [2009]. "Study of Chinese Values." In Kuo-shu Yang, Kwang-kuo Hwang, and Chung-Fang Yang [eds.], *Chinese Psychology(I)* [pp. 633-64].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 江宜樺(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文化。
- (Yi-huah Jiang [1998]. *Liberalism,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Taipei: Yang-Chih Book Co., Ltd.)
- 李美枝(2005)。〈己群己關係與公私概念〉，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 447-82。臺北：遠流出版社。
- (Mei-chih Li [2005]. "Self Versus Group Relations and Public Versus Private Relations." In Kuo-shu Yang, Kwang-kuo Hwang, and Chung-Fang Yang [eds.], *Chinese Psychology(I)* [pp. 447-82].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 何振盛、杜嘉芬(譯)，Denny Roy(原著)(2004)。《台灣政治史》。台北：商務印書館。
- (Roy, Denny [2004]. Jhen-sheng He, and Jia-fan Du [trans.]. *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吳重禮、鄭文智、崔曉倩(2006)。〈交叉網絡與政治參與：2001 年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的實證研究〉，《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8 卷，第 4 期，頁 599-638。
- (Chung-li Wu, Wen-chi Cheng, and Hsiao-chien Tsui [2006]. "Cross-Cutting Network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essons of the 2001 County Magistrate, City Mayoral and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s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Vol. 18, No. 4: 599-638.)
- 張德勝(1989)。《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中國思想的社會學詮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Te-sheng Chang [1989]. *Confucius Ethics and Order: a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aipei: Chuliu Publisher.
- 傅恆德(2003)。《政治文化與政治參與》。台北：韋伯文化。
- (Hung-der Fu [2003].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aipei: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 黃曬莉(2005)。〈人際和諧與人際衝突〉，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 521-66。臺北：遠流出版社。
- (Li-li Huang [2005]. "Social Harmony and Interpersonal Conflict." In Kuo-shu Yang, Kwang-kuo Hwang, and Chung-Fang Yang [eds.], *Chinese Psychology(I)* [pp. 521-566].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 楊中芳(1992)。〈中國人真的是具有集體主義傾向嗎？試論中國人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的價值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下冊)。台北：漢學研究中心出版。
- (Jung-fang Yang [1992]. "Are Chinese Really Collectivistic? A Discussion of Chinese Value System."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 Chinese People's value*. Taipe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楊國樞(1993)。〈中國人的社會取向:社會互動的觀點〉。楊國樞、余安邦(主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一九九二)》。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 (Kuo-shu Yang [1993]. "The Soci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 Soci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In Kuo-shu Yang, and Yu, An-bang [eds.], *Chinese Mentality and Behavior-Ideal and Methodology-1992*. Taipei: Laureate Publisher.
- 葉明華、楊國樞(1997)。〈中國人的家族主義：概念分析與實徵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3 期，頁 169-225。
- (Ming-hua Yeh, and Kuo-shu Yang [1997]. "Chinese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ssessmen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o. 83:169-225.)
- 楊國樞、葉明華(2005)。〈家族主義與泛家族主義〉，楊國樞、黃光國、楊中芳(主編)，《華人本土心理學-上》，頁 249-292。臺北：遠流出版社。

- (Kuo-shu Yang, and Ming-hua Yeh [2005]. "Familism and Pan-familism" In Kuo-shu Yang, Kwang-kuo Hwang, and Chung-fang Yang [eds.], *Chinese Psychology(I)* [pp. 249-292].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 齊力(2003)。〈個人主義、家族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三角關係格局〉，《市師社教學報》，第2期，頁115-45。
- (Chi Li [2003]. "Individualism, Familism, and Collectivism." *Shi Shi She Jiao Xue Bao*, Vo. 2:115-45.)
- 錢穆(1979)。《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台北：聯經。
- (Mu Chien [1979]. *Chinese Characteristic and China Culture: a Chinese History Perspective*. Taipei: Link Book Publish.)
- Agnew, John A. (1994). "The National Versus the Contextual: The Controversy over Measuring Electoral Change in Italy Using Goodman Flow-of-Vote Estimates."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3, No. 3: 245-54.
- Alvarez, R. Michael, and John Brehm. (1995). "American Ambivalence Toward Abortion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November): 1055-1082**
- Alvarez, R. Michael, and John Brehm. (1997). "Are Americans Ambivalent Towards Racial Poli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April): 345-374.**
- Alesina A, La Ferrara E. (2000). "Participation in Heterogeneous Communitie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847-904**
- Almond, Gabriel, G. Bingham Powell, Jr., Russel J. Dalton, and Kaare Strom (2008).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7th ed. New York: Pearson International.
- Baker, Kendall L. 1973.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Efficacy, and Socialization in Germany." *Comparative Politics* 6(1): 73-98**
- Banfield, E. C. (1958).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oyden T, Carroll JS, Maier RA. (1984). "Similarity and attraction in homosexual males: the effects of age and masculinity-femininity". *Sex Roles* 10:939-48**
- Bellah, Robert,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1986). *Habits of the Heart*.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leson BR, Samter W. (1996). "Similarity in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Young Adults: Foundations of Attraction, Friendship,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Commun. Rep.* 9:127-39**
- Byrne D. (1997). An Overview (and under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y within the Attrac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4:417-31.**
- Berscheid E, Reis Ht. (1998). Attraction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In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ed. Dt Gilbert, ST Fiske, G Lindzey, pp. 193-281. New York: McGrawHill. 4th ed.**
- Beck, Paul A. (2002). "Encouraging Political Defection: The Role of Personal Discussion Networks in Partisan Desertions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and Perot Votes in 1992." *Political Behavior*, Vol. 24, No. 4: 309-37.
- Barabas, Jason (2004). "How deliberation affects policy opin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687-701.
- Belanger, Paul, and Munroe Eagles (2007). "Partisan Cross-Pressure and Voter Turnout: The Influence of Micro and Macro Environmen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850-67.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 Curry, Richard O. and Lawrence B. Goodheart (1991). *American Chameleon: Individualism in Trans-National Context*.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onway, M. M. (1991).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 Carmines, Edward G., and Robert Huckfeldt (1996). "Political Behavior: An Overview." In Robert E. Goodin and Hans-Dieter Klingemann (eds.), *A New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223-5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sta, DL, Kahn ME (2003). "Civic Engagement and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n Economist's Perspectiv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al Science. 1:103-11.***
- Campbell DE. (2004). "What You Do Depends on Where You Are: Community Heterogeneity and Participation."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Conover, P. J., and Searing, D. D. (2005). "Studying 'Everyday Political Talk' in the Deliberative System." *Acta Politica*, Vol. 40: 269-83.
- Dryzek, John S. (2006). *Deliberative Glob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Giles, Michael W., and Marilyn K. Dantico. 198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eighborhood Social Context Revisite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 144-50***
- Gans, Herbert J. (1988). *Middle American Individualis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Liberal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X.
- Gottfredson, Michael R., and Travis Hirschi. (1990). *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94). *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al Politic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Hovland, Carl I., Irving L. Janis and Harold H. Kelly. (1953).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Opinion Chan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mmel,1955; Popkin, (1965); Hope,1975; Horan 1971; Jackson and Curtis 1972; Davis 1982; Knoke 1990; Mutz 2002a; 2002b from Mutz's 2002**
- Huntington, Samuel P. (1965).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 17, No. 3:386-430.
- Horan, Patrick M. (1971). "Social Positions and Political Cross-Pressures: A Re-Exami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August): 650-660.***
- Huckfeldt, Robert. (1979).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Neighborhood Social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579-92***
- _____ (1981).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su, F. L. K. 許煥光 (1981). *American and Chinese: Passage to differences*. 3th ed. Honolulu, H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University.
- Hofstede, Geert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London: McGraw-Hill.
- Hibbing, John and Elizabeth Theiss-Morse.(1995). *Congress as Public Enemy: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Coauthor,
- Hood, Steven J. (1998). "The Myth of Asian-Style Democracy." *Asian Survey*, Vol. 38, No. 9:853-66.
- Hibbing, John R., and Elizabeth Theiss-Morse (2002). *Stealth Democracy: Americans' Beliefs about How Government Should Wor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onald (1985)."Aggregate Stability and Individual-Level Flux in Mass Belief Systems: The Level of Analysis Paradox."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9, No. 1: 97-116.
- Knoke, David. 1990. *Political Networks: The 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eith, Bruce E., David B. Magleby, Candice J. Nelson, Elizabeth Orr, Mark C. Westlye, and Raymond E. Wolfinger. 1992. *The Myth of the Independent Vote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enny, Christopher B. 1992.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Effects from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February): 259-267**
- Kim, Yung-Myung (1997). "Asian-Style Democracy: A Critique from East Asia." *Asian Survey*, Vol. 37, No. 12:1119-34.
-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44). *From Mutz's paper*(2002)**
- Lazarsfeld, Paul F.,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68).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ighley, Han E. (1990).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Vol. 18, 18:459**
- Leung, Kwok. and Allan Lind E. (1986). "Procedural Justice and Culture: Effects of Culture, Gender, & Investigator Status on Procedural Preferenc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9: 125-36.
- Leighley, Jan E. 1990.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8(October):459-475
- Leung, K. 梁覺 (1987). "Some Determinants of Reactions to Procedural Model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A Cross-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3, No. 5: 898-908.
- _____ (1988). "Some Determinant of Conflict Avoidance."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Vol. 19: 125-36.
- Lee, Jun-han (2002). "Primary Causes of Asian. Democratization: Dispelling Conventional Myths." *Asian Survey*, Vol. 42. No. 6:821-37.
- Liu, Frank Cheng-shan (2006).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Changes in Electoral Choices: A Study of Taiwan's 2002 Mayoral Elec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6, No.1: 139-58.
- Liu, Frank Cheng-shan and Albert Shihyi Chiu (2011) "Network Heterogeneity, Partisan Defection, and Voter Turnout: Examine Theory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 No. 18
- Merton, Robert K. (1938).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 672-82.
- Mansbridge, Jane. 1980. *Beyond Adversary Democracy*. New York: Basic Books.**
- Markus, Hazel, and Shinobu Kitayama (1994). "A Collective Fear of the Collective: Implications for Selves and Theories of Selv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 20: 568-579.
- Mendelberg, Tali and, John Oleske (2000). "Race and Public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17: 169-91.
- Markus, Gregory B. (2001). "American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In James H. Kuklinski (eds.), *Citizens and Politics: Perspective From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401-31).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 University.
- Mutz, Diana C. (2002). "The Consequences of Cross-Cutting Network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6: 838-55.
- Noelle-Neumann, E. (1974).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 24: 43-51.
- _____ (1993).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 Our Social Sk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ol, Ithiel de Sola, Robert P. Abelson and Samuel Popkin (1965). *Candidates, Issues and Strategies*. Cambridge: MIT Press.**
- Pollock III, Philip H. 1983. "The Participatory Consequenc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A Research**

Note.”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6(3): 400-409

- Putnam, Robert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Rosenberg, Morris. (1954-55). “Some Determinants o Political Apath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8 (Winter): 349-366.**
- Rosenstone, Steven J., and John Mark Hansen.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Rubin, Donald B. (1976). “Inference and Missing Data.” *Biometrika* 63: 581-592**
- Rubin, Donald B. (1987). *Multiple imputation for Nonresponse in Surveys*. New York: Wiley**
- Rubin, Donald B. (1996). “Multiple imputation after 18+ yea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91: 473-489**
- Rosenberg, Shawn (2007). “Types of Discourse and the Democracy of Deliberation.” In Editor (ed.), *Delibe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Can the People Govern?*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Stone, William F., and Paul E. Schaffner. 1988.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Sniderman, Paul M. and Simon Jackman, 2002. “Democratic Discussion: The Role of Reasons and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in Political Argument,” in Gerard Grunber, Nonna Mayer and Paul M. Sniderman (Eds.) *Democracy Under Strain*.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 Tocqueville, Alexis De (2000). *Democracy in America*, Abridged, with Introduction. Trans. by Sanford Kessler, and Anno. by Stephen D. Grant.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 Theiss-Morse, Elizabeth and John R. Hibbing. (2005).”Citizenship and Civic Engagement”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8:227-49**
- Thompson, Dennis F. (2008). “Deliberative Democratic Theory and Empirical Political Scien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1:497-520.
- Ulbig, Stacy Garalyn L. Funk(1999). “Conflict Avoidanc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 Verba, Sidney, Kay L. Schlozman, and Henry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and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erba, Sidney, Nancy Bruns, and Kay Lehman Schlozman. 1997. “Knowing and Caring about Politics: Gender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9(4): 1051-1072**
- Wu, Chung-Li. (2003). “Psycho-Political Correlates of Political Efficacy: The Case of the 1994 New Mayoral Election,”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33(6): 729-760**
- Zipp, John F. and Joel Smith. (1979). “The Structure of Elector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1/09/30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政治參與
	計畫主持人: 邱師儀
	計畫編號: 99-2410-H-029-005- 學門領域: 政治理論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邱師儀		計畫編號：99-2410-H-029-005-					
計畫名稱：個人主義、集體主義與政治參與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2	2	100%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2	2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1	1	100%	篇	' , ' Network Heterogeneity, Partisan Defection, and Voter Turnout: Examine Theory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Taiwan' , with Frank C. S. Liu, Liu i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October, 2011): Vol. 2, No. 19 (peer-reviewed) 與中山大學政研所劉正山副教授都在進行類似研究，時而合作，時而獨立研究。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專書	0	0	10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100%	件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碩士生	0	0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專任助理	0	0	10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手邊三個與計畫相關之研究論文(其中一篇已發表)在寄出送審之前，都參加國內的政治學學術論壇。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教處計畫加填項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已有一篇因此計畫而產出的英文論文被接受刊登，為' ' ' ' Network Heterogeneity, Partisan Defection, and Voter Turnout: Examine Theory with Empirical Data from Taiwan' ' ' ' with Frank C. S. Liu, Liu is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October, 2011): Vol. 2, No. 19 (peer-reviewed)。另有有兩篇與此計畫相關之學術論文審查中，其中一篇為「修改後再審」（台灣政治學刊），另外一篇將於近期內寄出（預計選擇選舉研究）。

此次計畫結果學術成就在於，筆者從華人本土心裡學出發，與政治學界的「交叉壓力與政治不參與」等研究接軌，並從社會心理層面提出交叉壓力（由於交叉壓力是外在的、社會學式的變項）的另一種存在形式，也就是「衝突避免」的變項，補充政治學界此一領域的不足，也發現實證的連結。

社會影響方面，讓台灣社會審思我們的文化特質（和諧觀、集體主義）所產生出來的政治結果為何？尤其在政治參與領域中的意義為何？此次研究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儘管不是立即見效，但其對拼湊出華人文化的全貌，及政治意涵盡薄棉之力。

接下來筆者再接再厲，在將來的研究中擴大政治參與種類的研究，並運用更新的資料與跨年度的資料來做實證檢測，也希望在華人本土心裡中找到政治意涵更濃厚的元素，納入筆

者的研究體系。